

郑永年论中国



# 中国的 知识重建

郑永年◎著

西方“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中国知识的未来：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郑永年论中国

# 中国的 知识重建

郑永年◎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 / 郑永年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207-0020-7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知识体系—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8329号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

(ZHENG YONGNIAN LUN ZHONGGUO: ZHONGGUO DE ZHISHI CHONGJIAN)

作 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陈丽娜 李鹏飞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8.5

字 数：1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020-7

定 价：38.00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64023113。

## 出版说明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与我们每个个体的作为密切相关。在教育改革和智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知识分子们的知识贡献方面的使命尤为凸显。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尽管对各种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是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没能解释好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更不用说希望借此让外在世界来了解自己了。因此，知识分子即知识的生产者，其首要任务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而是需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

笔者在思考中国崛起的时候，越来越强烈意识

到，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拥有能够解释自己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的知识认同。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何谈强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重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的重建和文明复兴之间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本书里所提到的种种“彷徨”，也需要有知识建设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感。我个人感觉到，很有必要把此当成一个长期的事业来做。这本书对早先出版的《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与文明复兴》中知识重建部分做了重新调整梳理，并把这些年的进一步思考收录在一起，编成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先生和吴玉萍女士以及本书的编辑陈丽娜和李鹏飞，由于他们的努力，才能够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郑永年

2018年1月

# 目录

前言 / 001

## 第一章 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一、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往往都是错的 / 013

中国还不能回答“中国是谁” / 013

西方“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 016

中国“依葫芦画瓢”与中西方的相互“误解” / 021

二、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 028

研究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 / 030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 / 032

院士制度与“寻租” / 034

### 三、思想贫困及其方法论根源 / 036

道德拜物教 / 037

画地为牢自我禁锢 / 041

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 044

知识的娱乐化和虚假化 / 050

## 第二章 知识就是权力

### 一、知识分子与权力 / 055

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分子可通过创造知识获得权力 / 055

西方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解释现实的能力 / 059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知识分子与权力 / 073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 083

简单的结论 / 091

### 二、知识体系是最强软实力 / 093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没有话语权 / 093

没有知识体系，就没有国际话语权 / 101

思想和思维被殖民：中国为何还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 104

### 第三章 专业主义与知识体系建设

#### 一、知识体系与教育哲学 / 114

为什么要谈教育哲学 / 114

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缺什么 / 119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 / 124

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 / 136

#### 二、知识创新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 140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 / 144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 152

高等教育知识创新（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 / 159

中国高教改革与“文凭病” / 167

### 第四章 中国知识体系的未来：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 一、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 180

首要任务是中国人要了解自己 / 180

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 182

中国“走出去”的现实路径 / 189

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 194

教育哲学的未来——专业主义 / 200



二、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知识群体向何处去 / 208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危机四伏的“百花齐放”时代 / 208

中国社会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 212

知识、权力和责任：经验和教训 / 231

如何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 243

三、在“知”和“行”之间：智库的角色 / 255

政策研究者的“知”与“行” / 255

政策研究者的职责 / 260

## 前言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经超过 9000 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原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地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

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所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说的“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极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些时代，就很难有人们今天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

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

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能事。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

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以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这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除了与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

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